

1901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一九六四年第二輯

(內部發行)

附
系
十
一
新
日
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478/00/07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一九六四年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四年 十月

广州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一九六四年第二辑

一九六四年十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广东省报刊内字163号登记证

*

清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0.80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積累歷史資料和推進史料征集撰寫工作的開展。所選的稿，多是撰寫者（提供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或雖非親身經歷，但對某一項史實很熟悉並掌握到第一手材料而編寫的），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這種史料是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國解放前各個時期的各个方面，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教、藝術、宗教、民族、華僑、舊社會生活等的史料，不拘體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實具體而能反映當時重要歷史事件或社會面貌的發展變化者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南石头惩戒场”的片断回忆·····	彭 波	(1)
日本侵华企业台湾銀行广州支行·····	楊君厚	(11)
我三十年經營土菸业的回忆·····	邝匡敬	(21)
胜家縫紉机侵入我国市场·····	陆緒熙	(31)
旧社会金融市场黑幕一例·····	周瑞頌	(45)
抗战时的广东实(企)业公司·····	邱汉强	(51)
抗战期間封鎖潮汕淪陷区粮食内幕·····	練秉彝	(68)
記日軍投降后广州收兌中儲券經過·····	严显郁	(76)
大革命时期八和会館改制和优伶工会·····	梁家森	(83)
記广东优伶工会·····	仇飞雄	(91)
一九二六年广州先施公司职工罢工·····	朱 十	(97)
广州市新聞記者联合会的組織与斗争·····	謝汝誠	(101)
記反动的广东机器工会数事·····	陈八簋	(107)
广东兵工厂的“工人联合会”·····	白海东	(118)
广州乐行·····	朱 十、苏文炳、白燕仔、 潘 寬、馮源初、程 才、李 昆	(123)
广州西关士紳和文瀾书院·····	龔志鑒	(162)
广州的“媒家”·····	駱 亭	(168)
深圳賭场·····	紀汝賢	(174)
广州西堤災区重划黑幕·····	何亦楼	(179)
新一軍进入广州紀略·····	龙国鈞	(184)
新一軍在广州的罪行·····	練秉彝	(192)
国民党搗毀广州英領事館补充·····	梁霖、一知、任远	(194)

南石头“懲戒場”的片断回忆

(一九二七——一九三〇)

彭 波

距今卅多年前，在广州河南南石头有一个所謂“懲戒場”。离市区約数华里，地近江边，旧为砲台，清末英法联軍侵粵后，砲台被迫廢弃。民二（一九一三年），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利用旧址改建为井字形的二层楼房，外面原有围墙，加固加厚后，又設了望哨，以作監獄。全監計囚室二百五十六間，規定每間关八人，共可容二千零四十八人。分为东地、西地、南地、北地、东楼、西楼、南楼、北楼。原是用来关押普通刑事犯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后，却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被抓进去的，先剃光头，加上脚鐐（有的甚至上两副脚鐐，外加手铐）。

“四·一五”起，驀地关进千多人，連原有的刑事犯，共关着一千四百人左右，把各仓都塞滿。政治“犯”有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有十三四岁的劳动童子团员，有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更多的是青壮年。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黄埔軍校学生、店員、妇女，各地方的人都有，有讲广州話的，有讲客家話的，有讲普通話的，有讲海南話的。这些人被关进去以后，遭到酷刑拷打而死、病死、或拉出去杀死的很多，弄死了一批人后，又有新抓进的，因此监仓經常都

滿。如沈春雨、熊銳、彭學生、張云峯等同志就关在这里，后来在这儿被杀害。

我当时参加新学生社，在党的领导下搞革命工作，“四·一五”后匿居市内学旅被捕。先被关在国民党广州公安局看守所，关押了約两个月之后才被提解到該场，关在西楼十七号仓。同仓的难友有李潤生（共产党员、广东人）、段浩天、朱忠能（湖南人），吳安国（江西人、以上三人均黄埔軍校入伍生）、李錦堂（革命軍人、山东籍），和一位进来不久即患病死去、現在記不起姓名的工友；后来又加进一个叫陈延年的青年（不是那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同志）。李錦堂是高个子，二十多岁，患着沉重的脚气病，全身浮肿。同仓八人中我的年龄最小，我那时才十六岁。八个人坐臥都在地板上，每人睡舖，仅足容身，大家晚上并排靠貼着睡。患重病的工友就在我身旁，他死的那天晚上，七个人都未发觉，我也病着，发高烧，沉睡未醒，不知道他死，并肩睡了一夜。天明才发觉。

李潤生也病着，他是瘦个子，病得更加瘦削，肤色蒼白。他是搞工运的，是广州金属业工会书记，二十四五岁，是一位热情的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五时許，忽听到楼下西鉄門开闢，獄警在喚名，跟着，急促的脚步声直奔到我們仓門，大家屏住气，你看我，我看你。獄卒打开仓門就叫：“李潤生！出来！”又在斜对面仓口喊：

“何鴻柱！出来！”（何鴻柱是中山大学附中学生、共青团員、十七岁）。李潤生同志本来病得足軟无力，此时霍地站起，对着我們說：“好！祝大家早日恢复自由！永別了！”我震顫着手倒了一碗已經不热的开水給他喝，他接着一飲而尽，轉身泰然自若地对獄吏說：杀了我，还有許許多多的

李潤生！說畢，豪迈地步出倉門。他帶着腳鐐瑯瑯地边走边唱國際歌，獄卒凶暴地吆喝，他更高聲地唱着。我們還聽到他，何鴻柱、和樓下的幾位被押出的同志喊口號：“打倒國民黨！革命成功！共產黨萬歲！”直到最後的槍聲響了，歌唱和口號聲才停止。這次，還有彭粵生，譚其英、和中山大學三個工友，都被綑綁在鐵閘門外“宣判”，隨即被害於獄外的竹樹坡前。在屠殺的前一天（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廣州機器工會先派特務到該場叫上述被害者逐個“點相”認明後，再加一付腳鐐，押回倉中，次日即被害。

陳延年解進來才大半天，當日深夜即被拖出，但不聽到槍響。事後打聽，是被押往廣州殺害了。他不像革命分子，却像個華僑子弟，廿歲左右，衣着漂亮，還有金筆、金鍊、袋錢，被捕時都被國民黨軍警搜去了。有人說：這是國民黨反动派亂抓邀“功”，因為他也叫陳延年。

一天，敵人扛來一大籬麻繩，放在獄門口，接着便有几十个軍警出現在外面，這時又叫關倉。由獄警引着一群西裝革履、却个个蒙着面的傢伙進來，到各倉認人。這些蒙面野獸指一指誰，誰就被獄卒拖出。這次一共指認了十多人。被拖出的同志們都壯烈得很，齊聲高呼革命口號和唱國際歌，聲音傳到牢獄外面，反动派十分驚恐，因此才押到獄前的竹樹坡，這地方本不是“行刑”的地方，但反动派竟就地以機關槍掃射，每一個死難同志身上中彈纍纍。

敵人每殺一批人，事先獄內必出現麻繩，一條一條的掛起，標志掛一條繩就要殺一個人，我們管叫“掛繩”。如果有同難眼快瞧見外面在掛繩，說一聲“又掛繩啦！”這句話便象電流似的傳遍全監。大家咬牙切齒，恨不得沖出去同敵人搏鬥。但是鐵閘重重，腳鐐緊箍，許多人還病得有氣无

力。只有射出仇恨和憤怒的眼光，以凜然的正義向那些劊子手作無聲的抗擊。

南石頭懲戒場對付革命者是十分殘酷的。有種種酷刑如“放水燈”、“吊飛機”、灌水、踩肚、燒筋、皮鞭抽打等。“吊飛機”就是把人手足吊綁，然後用皮鞭一邊打（或用鐵棍撞胸口及身體要害處）一邊逼供。受過這種酷刑的會內傷吐血，終身殘廢。前幾年病故的市總工會的郭榮璋同志（他那時叫郭枝）和黨員杜偉同志就受過這種酷刑。當時香港罷工回來的洋務工人陳坤（現名陳永樂），也被吊打過。罷工工人葉林，也受過吊打，出獄後醫了很久，到現在還常咳出血。（杜偉、陳坤、葉林現仍住本市，他們都是見證人）。吊飛機、灌水、踩肚、燒筋等毒刑是把人從懲戒場解去市公安局偵緝課訊問時施加的，施刑之後或即殺害，或仍押回該場。“放水燈”，是敵人把政治犯按倒在地，在腹上放一石塊，用繩翹起他的手脚，扎成燈形，扛到江邊，投落水里，以後又把他拖起來，叫他供認，或者殺死。有的用豬籠裝繩拋下場外江中，任其載沉載浮死去，這也叫“放水燈”。

該場“放水燈”是在廣州起義後第四天開始的，當日十一時，他們在小輪船上用竹竿掛大繩麻繩，由特務持黑名單到場喚名，總共綁了六十多名出去“放水燈”，放下水時，還用槍頭上的刺刀戳插。

最初，反动派每夜都殺人的。一到黃昏，人人都不知自己今晚會不會被喚名。凡在夜間如聽到外面鉄閘响，就是要殺人了，獄中叫做“宵夜”。有時則在天蒙蒙亮開倉喚名，獄中管叫“飲早茶”。倘在白天殺人呢，獄中管叫“吃草”。場里的白色恐怖，筆者未能盡述。年紀大一點，特別是共產

黨員，都視死如歸，表現出革命氣節，非常鎮定，死，吓不倒他們。我意志不堅定，惊恐過甚，因而大病，不省人事，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否則今天還能憶述得多一些。有一個比我小一歲的知用中學學生（姓鄭、忘其名、是中山縣土紳鄭道實的侄子），既非勞動童子團員，也不是共青團員，只因他的書籍里有一本共產主義書刊就被反动派抓去，他家里很有錢，用錢買通了反动派，把他保釋出來，但出獄后因惊恐過度，終於病死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早上，場里還是象平時那樣，政治“犯”拖着腳鐐從各個監倉出來洗臉、大小便、放風。失了自由半年多的這批難友，都未知外面——廣州市這天正在發生的偉大革命風暴（廣州起義），有的人在黎明前便聽到砲聲和閤閤的機關槍聲。此刻仰首北望，天空中濃煙滾滾。才開倉不久，還未到獄警交班時間，大家正一堆堆地聚攏，忽地，狗腿們大吹哨子，厲聲高叫“關倉！關——倉！”大家又被趕進囚室。於是，瞬間全場靜寂。這種情況，照例又要殺人。這一天，吃飯都不開倉，大小便都不得出去，看病、什麼也不准。晚上，從倉房的小窗口看到遠處天空還有火光。关了倉却不見殺人，情形異乎尋常，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大家在猜論着。終於從獄警口中說出，說是“共產黨暴動”，我們心里樂得什麼似的。後來聽說起義失敗了，我們心上都像有塊大石壓着，跟着場內又進行大屠殺了，上述的“掛繩”這麼一籬籬，就是集體屠殺用的。這次殺了很多。

原來廣州起義第二天，獄里地下黨員即獲消息，準備弄開腳鐐響應。可是由於遠離市區，外應未及（河南被李福林盤踞着，在沿江一帶要衝、碼頭架設大砲機關槍，河北起義

群众正要冲过来解放我們的)，結果，随着外面的失敗，这里不能有所作为。弄开脚镣准备响应的几个同志被惨杀了。怎么会被发现呢？是监狱里面的“鬼头仔”举报的。后来做鬼头的，大家恨死了他，借故跟他爭吵，飽以老拳。这以后，凡打架的，都被禁閉在特別仓。鬼头仔，后被管场的調开。（地下党员准备响应起义及有鬼头仔这一叙述，仅系事后听来，我当时在病中未目覩）。

广州起义失敗后，场外更是警戒森严，场内更加殘酷，不断有人抓进又随时拖出施加酷刑，皮鞭、惨叫的声音，常常传进老难友的耳鼓。上面說过，反动派杀人最初多在夜間或天将亮时，秘密干的，獄中管叫“宵夜”“飲早茶”；广州公社失敗后，他們杀人却在白天了，而且多数是整批的集体屠杀。

陈銘樞当了广东省主席不久，带一些官員进场“視察”过一次。故意传出消息說：“陈主席很关怀这些陷于囹圄中的人，表示慰問。囑令改善生活，飲食卫生要搞好。政府要清理案件，准备释放”。一些沒有認識的人，听了这些話，抱有幻想。他們不知道这是反动派的詭計。对革命者使用屠杀摧殘不能得到效果时，施用另一面手法——怀柔伎倆，企图分化而已。

跟着“广州特別刑事法庭”成立了（記不清是陈銘樞任粵主席前或后成立的），被押将一年都未經提訊的我們，此时开始提审。我被提去“法庭”审問过几次，老是追問我是不是共青团員。伪主审是姓金的，有几个陪审——什么“民众团体”代表等。伪法官对我曾参加过的革命工作全不知道，沒有問过具体的問題，斤斤于“广州共产党学生中有你的名字，你何时加入共青团，誰介紹，做些什么事，从实招

来”。每次都說你供認了，就可释放，年紀輕輕，无知錯誤而已。他們企图用这种說話来騙取我供出种种。我当时坚决不承認，他們得不到什么口供。后判我两年徒刑。判决书上写着什么“姑念年少无知，誤入歧途，判处感化两年，期滿仍須察看”。这个所謂判決算是輕的。为什么我能得到“从轻发落”？原来我母亲在外面用錢“疏通”他們的結果。（后来出獄，知道我母亲共用了一千多元白銀。）

該场以后改称“感化院”。把全场政治“犯”編为甲乙丙三班，我被編在丙班，要受他們的“感化”。院长名罗邦，訓育主任为罗新杰，教官有凌广图（此人后来在日伪时代当了汉奸）、彭博文（后在职病死）、何兆甲、还有一个及一个代过課的均忘其名。每日上下午分班授課，課程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綱、建国方略、还有什么“中国革命史”等，并以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論的体系》、戴季陶、胡汉民的“著作”为教学內容；还有唱歌，罗新杰用风琴教；还教國語注音符號；却没有时事“学习”，报纸禁传入，绝对禁看，若被发现則要追究。而每逢星期一有一个“紀念周”，由罗邦、罗新杰“訓話”。罗邦講話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印象。罗新杰是去过日本留学的，据說是医生，是陈銘樞好友；并懂催眠术，多次在紀念周上教人催眠，說能治病，还当场拿“犯人”来实验給大家看，大家对此麻醉“訓練”，多是阳奉阴違的。有一次叫我們写文章，自述受“感化”的意見。我只写了几行字，牛头不对馬咀地也忘記說了些什么，好象只說希望快些恢复我自由。而有个別軟骨头却写了无耻的歌功頌德的說話，甚至表示反共，他們得此，視同至宝。还把那些“文章”印成小冊子，发給全场难友。对那些軟骨头、叛徒，大家非常憤恨，那些文章

(小冊子)被撕得粉碎，誰也不去看它。

“感化院”后改名“反省院”，只改名称，一切如旧。

关在那儿的同难，現在能記起姓名的，有这些人：宋时輪（現在北京），葛成烈（解放后任某省工业厅长），阮嘯仙同志的弟弟阮治中（他当时化名謝四。解放后在中山县一农场任干部），及共产党员張国樑、李永庆、刘秀文、陈禧連、梁在庆、江坤、刘光、李初、李隆、高国九、万冠英、謝汉、王务、陈荣、張俊仕，解放后在本省工业厅工作、已病故的譚劍秋（前鮑罗庭顧問办公室的职员），中山大学学生金泽忠，袁德韻、彭德祿、張兴、何鴻坚，中大附中学生李福潤、陈国瑞、胡秉基，广雅中学学生李成通，执信中学学生侯师魯，黃埔生、饒荣春、刘漫天、彭荣楨、蕭劍青、陈嘯樵、胡雪、朱偉民、郑强、尹希、朱朝謙、刘汉章、刘仲容、姚文錫、蔣云樵，广东人陈釗庸、梁冠那、梁肇幹、何瑞麟，甘肅省人胡廷芳，陕西省人郑維藩，湖南人周畏天，还有一个前清举人刘介人（当时已六七十岁），做医生的冼巽生，罢工工人黃木、何源、叶林、黎洪、謝流、駱耀华、陈胜、陈桂芳，广州工代会的杜偉，广州工人顏俊英、罗光华、易新长，农民梁权、卢瑞明、黃福海等。

女同难因被隔离着，无从得見。

当时，葛成烈，張俊仕、陈荣等同志領導大家秘密学习政治和时事，把偷传进来的报纸看过后加以分析，分組报告，獄卒巡到，就假裝讲故事說笑話唱京腔，有的則唸古文哼唐詩，狗腿走了又繼續討論。我沒有經常参加，情况不清楚，有时只是作为旁观者而已。

还有其他自己組織的学习小組，如数学、英語、日語、书法、繪画、拳朮等，这都不用秘密进行，管场者是知道的。大家在难友中找出有专长的来教，专长英語的教英語，专长数学的教数学，不受酬，学的各就所好加入任何小組，我参加过学英語。工农难友文化低，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另組織字、語文、算术之类的学习。这都是在各人都被判了刑期之后才能如此自学的，并且是自动組織起来的。一方面要上“感化院”的課，便利用間隙及早晚時間进行。有些工农难友学文化，从不会写信到会写，不会計算到学懂加減乘除。学英語的由初中程度到讀完一本商务版的《莎氏乐府本事》，能用中文翻释出来，等等。那个感化院，初时煞有介事地熱鬧一陣，“誨者諄諄”，可是逐漸地他們松了劲，“教官”常常缺課，这給我們多一些時間自学。他們的“感化”原是政治作用，但他們目的在乎金錢，利用职权秘密向被囚者家属勒索。

那时党在外面用巧妙的方法跟（场内）部分同志联系上，党多次派人以家属或亲友名义送来衣服、医药用品、食物和零用钱。不仅这样，还有办法秘密看到极为难得的馬列主义书刊。那个场管理錢見誠（又名錢国宝）老头子伪装同情，放寬探望檢查的限制，連《辯証法唯物論》、《社会意識学大綱》、《洪水》、《萌芽》、《奔流》等书刊都給送进。那是不怀好意的，他借此窺察难友們的思想动向，了解情况。他还常派一个从普通犯“提拔”出来做抄写的助手，进仓跟我們交朋友，假裝十分亲热，将了解的情况，向他报告。他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我們厮混，了解誰的家庭有錢或能出錢，好敲竹杠，謀索賄賂。例如那时我父亲在墨西哥作工，把半生辛苦积下的一点血汗錢尽数汇了回来，我母

亲又到处生借，用来送给法院、公安局的督察、和抓我的特务和管场人，弄到我倾家荡产，结果，我仍被判二年刑期，总共坐了三年多的牢。

黄埔四期毕业生饒荣春写了一首长诗《叛徒的呼声》，开头几句是：“一切社会的叛徒，一切惨败的人生的战士，一切土匪小偷，一切人所不齿的下流痞子！我們也都是人呀，我們也都有横的眼睛，直的鼻子，可是我們的权利被剥夺了！……”署名“君淦”（他是江西人），秘密传出邮付上海左翼文艺刊物刊登，编者成仿吾还加按语介绍。这本刊物，也弄了进来。（忘记是《奔流》还是《拓荒》）。

瘦个子，廿多岁的張云峯同志长于旧体诗。其七律一首，題《北窗远眺》，下署笔名“涵花”。另外一首七律《解嘲》，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忆①。其他几十首诗已经失传了。

云峯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在該场遭杀害，遺下老母和新婚不久的爱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六四年八月改写

（政協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供稿）

-
- ① 《北窗远眺》 行罢西楼轉北楼， 倚窗凭眺望江头。
可邻弱柳隨风舞， 时見飘萍逐水流。
汽笛呜呜来巨舶， 滄波滾滾簸扁舟。
看来最是禽魚乐， 海闊天空任遨遊。
- 《解嘲》 鉄窗居士被嫌疑， 獄里无聊学作詩。
兴到涂鴉忘抑韻， 才非倚馬可成詞。
不知藏拙邀人看， 貼笑方家說我痴。
我亦自知痴得妙， 胜渠終日只愁思。

日帝侵华企业台灣銀行广州支行

楊君厚

我于抗日戰爭之前，除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一段时期外，曾在广州沙面日本台灣銀行支行充当職員計二十余年。因职位低微，不能知全面及机密大事，所知仅限于广州方面的情况，但是，就所了解的种种情形来看，在华南各地的台灣銀行和华北方面的朝鮮銀行，实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軍”。三十年間，由于它的任务不限于經濟侵略方面，故情况比較复杂。加以各个时期的地方軍閥和官僚与之互相勾結，台灣銀行每每插手到政治上去，則更是超越了金融机构的范围，牽涉的面較广。千絲万縷，真是“說来話长”，因此，只好拉杂談之而已。

台灣銀行广州支行概述

日本自甲午战争夺取了我国領土台灣之后，即行成立了地方性的台灣銀行，是半官半商性質的。其本店（总行）“株式会社・台灣銀行”，設在台灣の台北市，而企业实权則操于东京。各地分行，亦吸收当地的商股，而直接归其总行节制管理。例如，广州方面豪紳巨賈如江孔殷（即江震公，前清翰林，做过清乡督办），梅普之（楊梅宾大綢緞庄的

老板)、林丽生(专销日货的英芳生记百货商店的老板)、楊樞(曾做过清朝駐日本出使大臣)和孔教会的林泽丰均为該行的“株主”(股东),拥有股票。这些股票的利息,直接由东京台湾銀行統一支付,每半年一次,其利率随每年获利多少計算,最高可达年息1—2分,較之銀行普通的存款,利息优厚得多。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台湾銀行和朝鮮銀行,是划开地区的范围而进行活动的。朝鮮、东北、华北沿海各地則属朝鮮銀行活动范围;台湾、华南、南洋、印度以及歐洲、美洲各地,則归台湾銀行設立分支机构,执行各种业务。

台湾銀行广州支行設在沙面,开办在前清光緒末年。(具体年份未詳)先前只是一个拥有行員数人的“出張所”(办事处),到了宣統至民国初年,由于业务的扩展,始昇格为“支行”(是那一年就記不清楚了)。全盛时期,单是华人职工,就达到四、五十人之多。同时,台湾銀行在其“旺盛”时期,更以資金創設了一座規模頗大的“南洋仓库”和“华南銀行”,业务益为扩展。(华南銀行地址不在沙面而在西堤二馬路。不明白底細的人,都誤認為是我国的民族資本,台湾銀行对外也不宣布是她的附属銀行。)

台湾銀行支行的負責人,职名叫做“支配人”,即是支行的行长。支配人及其下属各部重要职务都由日本人充任。华人受其僱用的分为兩級,高一級的叫做“雇”(日本話原来的叫法,不是“雇員”)低一級的叫做“佣員”(即雇用人員,但不是“雇員”,也不能单称为“傭”)。华人大部分是“佣員”,任各部助理及办出納等业务。其余杂差、苦力,亦属于“佣員”这級。所有佣員的待遇,与上級不同,連签到簿亦分开甲、乙两冊,不准混用。支配人、支配